

上海银钱界与1935年白银风潮

侯桂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1935年中国爆发了白银风潮。在此次风潮前后,上海银钱界受到严重的影响,大量的钱庄、银行破产。为渡过危机,银钱界不得不求助于国民政府,逐渐被国民政府所控制。

关键词: 白银风潮;银行;钱庄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为摆脱困境,实施白银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虽然在此过程中,上海银钱界多次向美国提出请求和抗议,但无法阻止美国白银政策的推行。随着白银的大量外流,金融危机的加剧,最终酿成了中国1935年的金融风潮,上海大量的钱庄和银行倒闭、歇业。为了挽救上海的金融,银钱业采取种种措施,但形势的发展迫使银钱业不得不求助于国民政府。在此次金融风潮中,上海银钱界除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外,还在政治上受控于国民政府。本文试就以上问题进行论述。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1933年,罗斯福入主白宫,开始推行新政。为摆脱并转嫁经济危机,决定仿效英国,采取货币贬值政策。1933年12月21日,罗斯福发表宣言,美国各银矿今后所产白银保证得到每一盎司0.64美元的价格。美国的白银利益集团也叫嚷着为白银做些事情。1934年1月,美国召开国会,议员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白银的议案,大多数主张美国大量收购白银。^①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上海银钱界“日益加重的疑虑”。1934年2月20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国发出照会后,上海银行公会又以相同的意思,向罗斯福总统发电呼吁,请美国加以慎重考虑。大意为:“本市银行业同人敬致贵大总统阁下,自贵总统施行复兴计划,使美元价格下跌,贵国物价果以上腾,失业者日渐减少。但敝国物价价格将继续下跌,白银势将流出,为投机者造机会。况敝国数千年来天灾人祸,人民生活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贵国购银政策,若继续推行,敝国农民生活将益感困苦。国际汇兑,益将有非常之混乱。双方经济均蒙不利。敝国银界同业极盼贵总统察敝国情形,将银价采取稳健之步骤,勿使突然高涨,造成汇兑上之困难。”^②

上海银钱界深知美国提高白银价格意味着什么:中国白银将会源源不断的流向国外,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会出现银根紧缺,市面紧张,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将会不断的倒闭。实际情况也正是

收稿日期:2001-02-20

作者简介:侯桂芳(1975-),女,山东省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究生。

如此,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作为实行银本位但又不产白银的国家,早已感受到了白银的流动。受白银价格变动的影 响,白银已从农村流向城市,又从国内流向国外,在1928年—1931年间进口的52000万元白银中的约4亿元左右分散在各地,自1931年下半年起,已开始逆转,白银已经流入上海,上海的白银存底从1931年末的26600万元,一年后增加到43800万元,1933年末达到54700万元。^④白银从农村流向上海的后 果,便是在广大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自1933年起已有少量白银开始的外流了,“当1933年上半年筹备伦敦会议开始时,银价从每盎司十六个半便士涨到二十个半便士,从中国出口的白银立刻有三千六百万 元,至下半年银价回跌,才略有进口,因此,这年白银净出口一千四百二十万元,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白银的第一次出超。”^⑤如果这样下去,上海势必会出现金融风潮。上海银钱界对此有着清楚的了解。因此,在 给美国总统发电的同日,银行公会也发电给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请求暂缓批准白银协定,“此际白银协定正在咨送各国政府批准中,我国政府一旦贸然批准,则对于此后白银问题势将受此拘束。不能自由伸 缩运用。故将请求财部在此美政府提高银价政策尚未完全明了之前,此项协定暂缓批准。”^⑥试图以此来阻止美国白银政策的推行。

罗斯福虽让人调查了中国金融市场情形,但并没有答应银行公会的请求。国民政府中政会也于2月27日讨论决定批准白银协定。对此,银行公会非常气愤,在2月27日对罗斯福提高世界银价的举动提出抗议,谓“中国所需者,为较好之政府,较低之捐税,较高之出口价格,与较有效力之交通制度;中国苟获其所需,则银价不致影响中国,欲扩大中国输出贸易者,其难题在提高茶、丝、皮、煤之价格,而不在提高通币之价格,但若种种银计划能使银价销增安定,则当然未尝无益于中国”。^⑦

但银钱界的抗议并不能阻止美国实施白银政策的步伐。1934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白银法案》,其要点为:①美国货币准备金,金为75%,银为25%,即“金三银一”的比例,为了达到这一比例,就要收购白银;②财政部长有权在国外购银;③总统有权命令国内存银全部交给造币局。^⑧当时,美国已有美金86亿元,但为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按法定价格计算,还差11亿盎司白银,此数额之大,相当于1933年世界白银总产量1.65亿盎司的6倍多^⑨。这样,美国要获得所需的白银,除实行“白银国有”外,就是高价从外国收购白银。经美国把白银价格一提,白银成了一种有厚利可图的商品,而在仍然实行银本位的中国、印度等国家,银的价格要远远低于美国的白银收购价格。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的白银以各种途径源源不断的流往美国,中国成了美国白银的广大的买方市场。请看杨格的记载:

“从2月到9月,中国政府和美国进行交涉之际,白银流失一天比一天严重,开头七个月内共有价值5000万元的白银从上海出口,8月份的一个月之内出口8300万元,另外还要加上20%从其它口岸运出的数额。……自6月底至9月底三个月之内,上海银行白银存底,从58300万元减少到45100万元。”^⑩下面则是另一个1934年7月至12月的中国白银输出数量统计表:

1934年7月—9月中国白银输出数量表:^⑪

时期	输出净数	时期	输出净数
1834年7月	24,308,009	1934年10月	56,332,138
8月	79,094,748	11月	11,327,560
9月	48,139,773	12月	11,974,659

并且形势继续发展,“1934年10月13日以前的一周内,……汇价猛涨到每一枚中国银元合0.37美元或英元18便士以上。但是银在伦敦的汇价上涨得比上海的银元汇价还快,10月12日伦敦电汇贴水9%,13日贴水10%,局势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⑫因此,银钱业同业公会林康侯、秦润卿、叶扶霄等再次给财政部呈文,“窥自海外银价高涨以来,我国内地生银,纷纷集中上海,复由上

海流出国外，其出口之数与日俱增，以至内地金枯寂，百业凋敝，上海存银数额，近以出口逐渐加多，且银价高涨，国内物价愈益低落，工厂无法维持，工人流离道路，长此以往，诚恐富源日竭，影响金融，国计民生，亦受其害，……为此迫切陈词，恳请迅予设法防止，以保富源而维持国本”^②。

鉴于银钱界的一再呼吁和形势的发展，10月14日晚，财政部长孔祥熙召开金融会议，宣布，财政部自10月15日起开征白银出口税，①银本位币征出口税10%，减去铸费2.5%，净征7.75%；②大条银及其他银类，加征出口税77.5%等^③。目的是以求保护中国的基本白银储备，并制止汇价的上升，以求避免再次造成严重困难。^④征收白银出口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确实限制了白银出口，据记录，1934年10月14日之后头几个星期内，上海只有少量白银出口，此后，就难得看见白银出口的记录。有记录的出口几乎全部是由中央银行运往美国出售的白银，而这些白银还都是等到1935年11月币制改革之后才开始的。^⑤但是，白银价格仍在不断的上涨，每一盎司白银的价格在中国开征白银出口税之前是0.50美元，到了1935年1至3月间，银价已经升高到0.53美元至0.55美元之间。4月10日，美国宣布白银收购价格为每盎司0.71美元，4月24日涨到每盎司0.77美元，4月27日涨到0.81美元的高峰，1935年5、6月份的银价甚至达到1933年时的2倍以上。^⑥虽然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外汇平准委员会，征收平衡税等，但中外银价差的进一步拉大，使白银出口成为一项有巨利可图的事情，如“5月17日伦敦银价为35.375便士，而上海英汇行市只有20.50便士。据此计算，当时如偷运银元100万元出口，可获差益40万元，除去运费和一切费用，纯益当在30万元左右。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利，更助长走私之风。”^⑦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国民党征收白银出口税，竟成了一种“刺激白银行情看涨的原因”。所以，白银的合法出口虽然被限制，但走私出口却由于海外银价的升高而变得日益猖獗，请看下面的几则记载：“据最可靠的估计，仅在1934年的最后几个星期内，即有价值2000万元的白银走私出口；1935年一年以内，白银走私估计约在15000万元之间……”^⑧；“另据中国银行和耿爱德估计，1934年白银走私出口约有2000万元，1935年激增为15000万元至23000万元之间，几等于1934年下半年合法出口的60%至90%。”^⑨这样，由于白银的大量外流，上海各银行的存银已大量的减少，造成上海存银日缩，银根紧缺。“据路透社报告，十二月六日存银34400百万元，12月13日只32500万，较上星期又减少900万元。二十日查仓只32000万元，又减少了500万元。”^⑩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根紧张已达到极点，1934年间钱庄收取的利息从每年6%上升到16%在上海几乎是无论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⑪上海金融界酝酿着危机。

二

钱庄是靠借款运作的，这时受市场的影响，许多商店和工厂倒闭，欠下钱庄大批贷款。放款无法收回，钱庄也就宣告破产。而在经济危机初期白银由外地流入上海时兴起的基础薄弱的银行也抵挡不住危机的冲击，开始大量的倒闭。^⑫1935年春节前夕，突然三日之间连倒了四家，春节过后，又有四家因亏折自动收款，在四月底大比期，又倒闭两家，端午节前后，又有一家信誉和规模与汇划钱庄不相上下的元字号钱庄倒闭，^⑬标志着1935年白银风潮的到来。金融市场一时“风声鹤唳”，惶惶不安。

这时，无论是比旧式钱庄较有实力的新式银行，还是钱庄业自身，都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救助金融市场。

1934年底，经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拆放千万元，以帮助银钱界渡过难关。

1935年2月3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联合允许各钱庄前往无限制押款，但须有相当抵押品。由于垦业银行的大股东黄伯元也兼营地产，市场上产生了该行要倒闭的谣言，致使该行在2月2日发生挤兑，3日，各银行对该行钞票均照收，使挤兑在8日得以平息^⑭。1935年3月2日下午，钱业公会召集第二届第十七次会员代表常会，福源、福康、同春、康益等钱庄均有代表参加。在讨论救济

市面问题上,各钱庄决定仍继续承做信用放款,并不停止,但稍加审慎。^②

钱业公会也决定了新的营业方针,来救济本业:①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本届大结束时,向各庄所放押款,迄今尚有500万元以上未能按期赎回。此项押款,例以三月为期,届满即须取赎或请转期。致使各庄提心吊胆,时感局促不安。故钱业方面,现希望中交等行将订期改为三月一结,俾资周转。②通告各庄对于采办洋货商号,其中尤以销售奢侈品之商号,不予信用借款,藉以减少入超。间接可减少白银大量出口。③市面未复常度以前,各庄营业取最慎重态度,其对于业务之信用借款,复无限制者,尤宜力图谨慎,以厚实力,同时对于各方面之存户,更当设法为其作安全之保障云。^③

4月27日,“连日银行向钱庄放出之款已逾2200万、计中央、中国、交通联合放800万,中国银行独放900万、交通银行独放300万、四行共放200万”,使钱庄受到接济后困难减少。^④

虽然如此,金融市场仍然紧张,倒闭、歇业者仍接连不断。此时,仅靠银钱业自身的力量,无法渡过此次危机,尤其5月24日美丰、明华两银行停业后,其他几家遭其波及,也宣告清理。更为可怕的是,“一般人士对于若干金融机关,渐渐有不敢信任之心”。^⑤一时“沪上谣言蜂起,浮资之存在银钱业者,群起挤提。金融风潮骤至,造成紧张之形势。”^⑥改组后的中国银行于6月1日起开办储蓄业务,这对正在竭力挣扎图存的商业行庄,无疑是雪上加霜。由于存户争取安全,纷纷提款,转存中行,一般行庄越发感到恐慌,市面银根更加紧张。^⑦因此,钱业公会在6月2日召开紧急会议,除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规定提取的存款仅限五百元,以防止挤兑外,还公推公会主席秦润卿做代表去向国民政府求援。6月3日秦润卿即去拜谒财政部长孔祥熙,“沥陈困难情形”,请求救助钱庄。面对钱业公会的请求,财政部长孔祥熙以“钱庄营业为救济工商业,安定市面起见,关系工商业甚巨”,因此决定由政府来援助钱庄度过危机,“以钱业准备库押品,财部先拨借公债,两千万元,以资救济”。^⑧各钱庄听到这个消息,“极深感荷”。6月7日,钱庄就领到了一部分公债,这时,各钱庄“周转渐趋松动”,“市面稳定,人心渐安,中国、交通、四行储蓄、盐业、绸业、上海等银行,存款激增,钱业市场,上下午两市洋拆,均为一角八分,汇划头加水,仍为最高峰七角。”^⑨钱业暂时渡过了此次端午节危机。

在市面渐趋安定后,钱业本身又开始注意改善业务,来谋求金融安定。6月10日,钱业公会召开经理会议,秦润卿、裴云卿、俞佐庭、钱远声等参加了会议,决定了五项办法,并钱业联合准备库加入银行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票据交换所。翌日,公会通告各庄如次:①各银行现存各庄汇划洋款,一律同时转存钱库,嗣后各钱庄不再收各银行汇划存款;②各庄需用汇划头寸,均向钱库拆借押品;③钱库需用划头,得提出押品向银团拆借;④前向中央、中国、交通所做道契押款,本月十一日先向财政部监理委员会登记,只有此一天,过期不候,或要新做道契押款,亦于是日必须登记,其做法均照工部局估价计算;⑤前向中央、中国、交通所做公债票押款,现照本月份市价实足照做,新做亦照此办法,将来市价低落四元时,须补缴足数。

银行公会也于6月11日开紧急会议,议决赞成钱业公会议决之第一项,并于翌日通告各行及联合准备委员会查照办理。略谓此项办法关系银行业收解极为重要,本会援于11日下午二时召集紧急执委会议,决定:①各银行十一日止所存钱庄汇划存款,自十二日起均发存钱库,开户往来;②嗣后各行每日所收往来户之会员钱庄汇划票据,统送钱库。如支用汇划款项,一律支钱库,其所收外币及非会员钱庄之汇划票据,统由各行自派老司务收取;③各银行如轧缺,必须抵解之划头,可以存在钱库之划头,向钱库照市划用,钱库除向市上划进外遇有短缺,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商议拆借,拆息由三行定之;④各银行因必须装运现洋至各埠时,可向中央、中国、交通依照汇款办法请求代汇;⑤关于联合准备委员会第七号通函,对于各行存在交换所汇划款项限制办法,转仍适用。^⑩6月12日下午,在宋子文的邀请下,银钱两业领袖贝淞荪、秦润卿等一起,决定两业合作来稳定金融。在12日晚上,银行公会又厘定钱业汇划详细办法,并且通告各会员银行,“今日起凡会员钱庄付款

票据，一律由银行会代收，由各庄给钱业准备库之划条，送中交两行向钱库轧帐、钱业向各银行收款，取同样办法、接受救济钱庄公债押款之中央、中交、中南、金城、盐业、大陆等十一家银行，今共同组织银行团。”^⑨6月15日，救济钱业的办法又有所变更。前第74号通函所规定之各行汇划限制办法，即行废除，完全实行集中收解，“凡票据交换所之会员银行，收得钱业公会会员钱庄之票据，不再向各庄直接收解，均交由票据交换所汇向钱业准备库轧帐，同时钱业公会会员钱庄，收得票据交换所会员银行之票据，均交由钱业准备库，汇向票据交换所轧帐”，同日，十时起，以银行票据交换所特在香港路该会大厅，设交换银行存票处，派办事人员担任专收会员银之钱庄票据，同时，钱业联合准备库，在宁波路该会内，设会员钱庄存票处，派办事人员担任专收会员钱庄之银行票据。^⑩在6月19日，各钱庄以道契栈单等抵借金融债票，提供保证2800余万，折票价2500万，出八厘息，向银团贷款^⑪。至此，上海金融在银钱两业的合作及国民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开始逐渐稳定下来。但美国白银收购价仍持续在0.70美元上下，故金融危机仍未完全摆脱，正如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对《申报》时社记者谈，“本市金融状况，经财部及银钱业竭力挽救，上半年安然渡过，表面上已渐趋安定。实际上危机仍深，以往救济，尚属治标，以后须着重治本，否则不免崩溃”。^⑫直到1935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之前，仍有钱庄和银行在倒闭。

三

在这次白银风潮中，上海银钱业损失惨重。就钱庄而言，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金融组织在已经在走的下坡路上，被进一步削弱了。下面是1935年上海倒闭、歇业的钱庄：

在1935年金融风潮中倒闭、歇业的钱庄^⑬

时间	牌号	大股东	倒闭/歇业
1935年1月30日	荣康钱庄	麦加利银行买办王宪臣	倒闭
1935年1月31日	益康钱庄	丝商严如龄	倒闭
1935年2月1日	德旭钱庄	潮州帮郭柏香	倒闭
1935年2月1日	宝大裕钱庄	丝商徐晓霞	倒闭
1935年2月8日	永丰钱庄	皮毛商兼洋行买办陈春澜	歇业
1935年2月8日	益昌钱庄	洋布商徐承勋	歇业
1935年2月8日	寅泰钱庄	纱商兼大英银行买办徐庆云	歇业
1935年4月20日	永兴钱庄	城内绅富郁震东	倒闭
1935年4月21日	同泰钱庄	粤帮大地产商谭同兴	倒闭
1935年5月28日	鼎牲(元字号)钱庄	茶商洪瑞侯等	倒闭

到了1935年下半年，上海只剩下了48家汇划钱庄。

除了受金融危机的打击而使实力受到削弱外，钱庄还逐渐被国民政府所控制。在财政部向钱庄拨发公债时确定的方式是：①政府组织钱业监理委员会负责办理放款事宜，凡欲放款之钱庄，须先将抵押品(地契、公债、物品等)，汇交钱业准备库，由钱库送交钱业监理委员会审理，合格后方可向该会领取金融公债，转向银行贷款。借款各庄每隔七日，须将资产负债情形，报告监理会，以便随时审核；②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组成放款委员会，放款总额以2500万元为限。钱庄借款以钱业准备库之押品及钱业公会报单为第一重担保，以财政部拨发之2500百万元金融公债为第二重担保，借款利率按年息八厘计算。^⑭国民政府借机在财政上控制了钱庄。孔祥熙还趁钱业公会在6月2日向国民政府求助时成立钱业监理委员会，它成了国民政府救济金融危机时的代言人，可以发号施令。它的5个委员是徐堪、杜月笙、王晓籁、顾贻谷、秦润卿，前三位都和孔祥熙及国民政府有着

特殊的亲密关系,而作为钱业公会主席的秦润卿却位于五委员之末,不过是孔祥熙顾全影响而不得不任命的。端午节刚过,秦润卿主持了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就无奈宣布引咎辞职。6月4日,钱业监理委员会成立,会议公布商决各点如下:①钱业公会借款押品为道契公债及货物三种,其作价已分别议定标准。②2,500万之公债,由本会全数领到,交由中央银行寄存。俟钱业公会将押品送交本会审核确定后,随时由本会向中央银行抵领债票,至钱业各庄领得债票后,向中、中、交三银行抵借现款,其折扣、期限、利息等则未商定标准。钱业公会获悉财政部拨发公债救济之决定,即通知各庄将所需款项向会申请登记,惟将来借款时,并须将各庄之资产负债情况造具清册,送会核定,照数开始陆续拨发。^④这样,钱业集中受公会及联合准备库之管辖,政府只需控制钱业公会及钱业联合准备库,即可控制所有钱庄。1935年,钱业公会委员会改选就职,典礼中由国民政府代表主持宣誓仪式,显示政府在钱业公会内之影响有所增强。^⑤

此后,6月5日,财政部以“近来银行钱庄时有倒闭,停业后又复故意拖延、久不清理,影响市面、损害人民甚巨”为由,命令银钱两业公会,规定了清理办法六则:①停业银行钱庄,除经法院宣告清理者外,均由本部指派专员,会同该同业公会清理,其经法院宣告清理之银行钱庄,亦应指派专员,调查清理情形,随时报部备查;②清理期间,自停业之日起,以三个月为限,非有相当特殊事由,不得呈请延展,但在本办法令行以前停业者,自本办法令行之日起算;③清理期内,如查有经理人或董事监察人,有违法舞弊情事,即行看管,依法惩办;④资产折实后,寸欠不能十足相抵时,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银行,应即依法申请宣告破产,其余银行或兼营储蓄之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银行或钱庄,应依法请经理、董事、监察人、及股东人等以聊带无限责任、限期理楚;⑤清理时期,经理、董事、监察人及无限责任股东人等,不得离其住居地,如有意图逃亡或隐匿毁灭财产之行为时,得加以看管,其已逃亡者,并得由本部所派专员呈请通缉;⑥专员监督清理一切手续,得准照商人债务清理暂行条例办理。^⑥7日,就派定了监督清理员。此后国民政府又多次下令严禁钱庄倒闭、歇业,并派钱业监理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后方能确定其是否属于倒闭破产之列。当然,这有利于阻止某些钱庄的故意倒闭从而来稳固金融市场,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对钱庄的控制,使这一传统金融组织进一步依附于政府。正如麦克尔德利所说:“经济上的需要迫使钱庄转向政府请求援助。”但是“其代价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控制”。^⑦“1935年,南京政府对这一部分钱庄的控制程度在南京政府十年时期内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⑧面对这种控制,钱庄感到无可奈何。

此外,钱业监理委员会还赋予银行业救济钱庄之地位,强制钱业从属于银行业,强化钱庄对银行之隶属性。^⑨正如张郁闾所指出,1935年后,钱庄几沦为银行之“跑街”。^⑩这就加剧了银钱界内部的分化。

本文对上海的钱业论及的较多并不表明银行界没有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受到影响。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早期,上海银行界的确并没有受到坏的影响,相反,大量的资金从农村流入上海等沿海城市,“据中国银行统计,1932年从内地流入上海的现银,平均每月为600万元,1933年内地现银继续流入上海,据上海银行调查,这年自华北各地流入合计2400万元,自华中长江流域流入约5000万元,自华南流入约600万元”。^⑪这使一般私营银行存款的速度尤其惊人。如下表:

1932—1934年私营银行存款统计(单位:千元)^⑫

年份	商业银行	储蓄银行	农工银行	专业银行	华侨银行	合计	指数
1932	716,935	18,511	136,604	121,043	79,358	1,072,451	100
1933	848,357	31,735	177,438	141,960	129,551	1,239,041	123.94
1934	1,006,454	41,389	212,825	172,834	145,717	1,579,219	147.25

存款的激增,使1934年上海主要银行的利润高达创记录的3120万元,在1934—1935年间又新开了11家银行,1935年全市银行总利润确有所减少,但所减不过220万元,为数甚微。^⑬但这

时很多银行受资金流动的刺激,把投资方向转向房地产等投机业,“许多银行纷纷扩建行屋,兴筑大楼。上海的一些主要建筑,如四行储蓄会大楼、大陆商场、国华银行大楼、垦业银行大楼、上海银行大楼、广东银行大楼、中汇银行大楼和中国通商大厦均在这一时期建成”^②就连以稳健著称的陈光甫所经营的上海银行,1929 年投资房地产的金额,只有 140 万元,仅占存款的 2%,1932 年有价证券投资占存款额的 5%,1934 年为 9%。^③这种偏离正常轨道的投资,为其后来的倒闭埋下了祸根。在危机中一些银行也抵挡不住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倒闭,如下表:

在 1935 年倒闭或停业的银行^④

时间	牌号	大股东或主要负责人
1935 年 1 月 1 日	嘉华银行上海分行	粤帮和港帮
1935 年 1 月 21 日	通易银行	董事长为南得大地产商张澹如
1935 年 5 月 24 日	明华银行	总经理张纲伯
1935 年 6 月 4 日	宁波实业银行	总经理邬志豪
1935 年 6 月 4 日	江南银行	苏州帮
1935 年 7 月 3 日	世界银行	总理由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兼
1935 年 9 月 4 日	广东银行上海分行	总行在香港,为粤帮主要金融机关
1935 年 9 月 16 日	香港国民银行上海分行	总行在香港,为粤帮主要金融机关
1935 年 9 月 21 日	信通银行	证券业巨头孙铁卿创办
1935 年 10 月 11 日	大沪银行	本地帮
1935 年 10 月 22 日	华业银行	经理为北洋财阀梁士诒之子梁定新

除经济上受危机的打击外,银行和钱庄一样,也逐渐被国民政府削弱、控制。在蒋介石看来,金融恐慌与经济困境,根源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其中又以中国、交通两家大银行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不同中央“彻底合作”为症结所在。而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家璈是典型的西方式的银行家,历来主张银行家行动自由。他曾在 1921 年敦促北京政府严格控制财政,实行预算改革。而他又反对孔祥熙为取媚于蒋介石而实行的赤字政策,被孔祥熙视为最大的敌人。^⑤这就决定了张嘉璈及其中国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必然被削弱的命运。1935 年 2 月,蒋介石把孔祥熙与宋子文召到汉口,进行秘密协商,决定利用金融危机之时,削弱银行界的力量。1935 年 3 月,孔祥熙就在上海突然发动了银行事变。中国银行由宋子文掌权,他亲自面告张嘉璈,蒋介石希望他立即脱离中国银行。^⑥这次银行事变在银行界有重大的影响,它是“南京政府整个十年中与企业家关系的一次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改变”,“大银行的经理们曾是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惟一企业集团,他们的失势,表示政府完全统治了金融界,也结束了企业家独立的有影响的集团的地位。”^⑦

4 月,政府又以增资改组的方式,控制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中央银行此后全系官股,不必具论;中国、交通两行,原本政府资本仅占 1/5(投资实数,中国银行为 500 万元,交通银行仅 100 万元),1935 年 4 月,中国银行之官股增加 1500 万元,连前合计共为 2000 万元,适占该行资本总额 50%,亦占该行资本总额 55%,故政府顺理成章取得中、交两行之监督权。增资之后,两行之官股董事按比例增加,董事长亦由官股董事中选出,政府对中、中、交三行之控制乃愈趋稳固。^⑧

国民政府在夺取了中、交两行后,趁端午节前后的金融风潮扩大,市上筹码枯竭之时,又唆使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囤积大批中国实业、四明和中国通商三家银行钞票,一次汇数持向三行兑现,使实业银行在 5 月 30 日,四明银行在 6 月 1 日,通商银行在 6 月 7 日发生了挤兑,然后又由政府出面救济,使它们渡过了危机,免于倒闭。但中国通商银行之总理由傅筱庵易为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长之顾治谷,四明银行由孙衡甫改为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中国实业银行由刘晦之易为中央银

行国库局长胡孟嘉。^⑩风潮过后,三行实际上成为政府银行之局,三行之发行问题自然亦受政府之管辖监督。^⑪

1935年,宋子文、杜月笙和唐寿民被选入上海银行公会董事会,使“商业银行家们甚至对一贯代表他们利益的惟一组织也失掉了领导力量”。^⑫1936年拥有资产占全部会员银行资产绝大部分的八个成员银行也被国民政府所控制,使南京政府在这个公会组织中有了更大的权利。从此,上海银行界失去了在早期所获得的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被贬低到了无足轻重的附庸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上海银钱界在1935年金融危机中,不但受到了经济上的沉重打击,而且还被国民政府所控制,失去了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成为国民政府的附庸,从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

注释:

- ①[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232页。
- ②《银行周报》第18卷第7期,1934年2月27日。
- ③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30页。
- ④《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营业报告》,转引自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载于《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
- ⑤《银行周报》,第18卷第7期,1934年2月27日。
- ⑥《申报》1934年2月28日。
- ⑦《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0页。
- ⑧石毓贤:《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
- ⑨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35页。
- ⑩《财政部新货币制度说明书》,转引自钟祥财:《试析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 ⑪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37页。
- ⑫《申报》1934年10月15日。
- ⑬《申报》1934年10月15日。
- ⑭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37页。
- ⑮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38页。
- ⑯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39页;钟祥财:《试析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 ⑰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载于《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
- ⑱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38页。
- ⑲黄如桐:《1935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概述及其评价》,载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 ⑳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44页;金国宝:《白银问题对策之检讨》,《银行周报》第19卷第4期,1935年2月5日。
- ㉑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44页。
- ㉒麦克尔德利:《上海旧式钱庄》,第176页,转引自杨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102页。
- ㉓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㉔《大公报》1935年2月3日。
- ㉕《钱业公会布会继续放款》,《银行周报》第19卷第8期,1935年3月5日。
- ㉖《银行周报》第19卷第7期,1935年2月26日。
- ㉗《大公报》1935年4月28日。
- 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 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5页。
- ㉚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㉛《财政部实力援助钱业》,《银行周报》第19卷21期,1935年6月4日。
- ㉜《申报》1935年6月7日、6月8日。
- ㉝市隐:《上海钱业集中汇划》,《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号,1935年7月16日。

- ⑬《大公报》1935年6月14日。
- ⑭《申报》1935年6月15日。
- ⑮《大公报》1935年6月19日。
- ⑯《申报》1935年7月4日。
- ⑰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⑱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台北中央研究所1981年版,第184页。
- ⑲《上海钱庄史料》,第236页。
- ⑳《中行月刊》,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第92页,转引自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第185页。
- ㉑《大公报》1935年6月6日。
- ㉒麦克尔德利:《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在社会变动中的传统机构》,第180页,转引自(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 ㉓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㉔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第185页。
- ㉕张郁陶:《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民国四十六年,上海,第132页,转引同上,第184页。
- 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民国二十二年度(一九三三)营业报告》,转引自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㉗中国银行编:《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全国银行年鉴》,页S三十八—四十二,转引自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㉘钱涇:《上海金融恐慌的回顾与前瞻》,《东方杂志》第33卷第22号,1936年11月16日。
- ㉙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㉚徐予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 ㉛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
- ㉜参见《中国十银行家》:《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23—125页。
- ㉝《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140页,转引自《中国十银行家》,第32页。
- ㉞江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第449页,转引自《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29页,(美)易劳逸著:《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 ㉟工宗培:《中国金融业之今后动向》,《申报月刊》第四卷第5期,1935年5月15日,第34页,转引自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第183页。
- ㊱吴承禧:《民国24年度的中国银行界》,《东方杂志》第33卷第7号,1936年4月1日。
- ㊲宫下忠雄:《中国银行制度史》,第79页,转引自郑亦芳:《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第185页。
- ㊳《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42页。

Circles of Banks and Private Banks in Shanghai and Silver Crisis in 1935

HOU Guifa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200234)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silver policy of America, a silver crisis broke out in China in 1935. In the course of this crisis, the circles of banks and private banks in Shanghai were seriously affected, and many of them went bankrupt. In order to pull through this crisis, banks and private banks in Shanghai had to turn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or help, and they were gradually controlled by it.

Key words: silver crisis, banks, private banks

(责任编辑:申浩)